

绝版中国

受伤的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孤本

《新周刊》杂志社编



《新周刊》『读城·问城』书系

漓江出版社



绝版中国

受伤的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孤本



《新周刊》杂志社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版中国：受伤的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孤本 /《新周刊》杂志社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407-4111-2

I.绝… II.新… III.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国 IV.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93082号

绝版中国：受伤的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孤本

作 者 《新周刊》杂志社

责任编辑 刘春荣

美术编辑 罗 森

责任校对 章勤璐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060 1/16

字 数 738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 001—15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4111-2

定 价 38.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中国真的有过五千年文明？

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这文明存活过的完整证据？

文明本来是有的，光辉灿烂；证据本来是有的，遍布华夏。

只因我们几代人在毁城灭迹，并令每一座城市都成了受伤的城市。

历史缺席了，城市虽然更新，但已千城一面，并且魂不附体。

现在，也许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历数受伤的城市中的文化孤本，珍视我们的绝版中国。

《国中别集》

总编辑：王
副编辑：王
编辑：王
校对：王
设计：王
印刷：王
发行：王
地址：王

ISBN 7-309-04111-1 定价：25.00元

《新周刊》“读城·问城”书系

《绝版中国》

总监制：孙冕 刘胄人

总策划：封新城

策划制作： know!
知道分子图书工作室

《绝版中国》

主 编：何树青

执行主编：刘瑛 谭山山

视觉指导：傅沙

封面设计：万璿卿

封面篆刻：林东昇

版式设计：黄东

图片编辑：李健 黄亮

图片处理：谭福健

校 编：刘谦骏

资料搜集：袁喆 古韶珍 朱晋 邹雅颖 张冬梅 陈婷婷

目录

我们时代的心中困兽——寻找五千年文明存活的证据	001
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所长张兵：城市规划概念被滥用了	005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城市文化建设要避免 8 个误区	007
国家文物古迹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谈古建筑与文物的保护	009

受伤的城市之西部	011
----------------	-----



西安012



敦煌036



成都016



银川042



昆明020



喀什048



重庆026



平遥052



乐山030



凤凰056



丽江060



镇远064

受伤的城市之中部069



北京070



太原104



天津078



济南108



呼和浩特084



临沂116



郑州088



武汉124



洛阳092



襄樊130



开封096



长沙136



保定100



合肥144



歙县150



景德镇154



桂林158

受伤的城市之东部163



上海164



南京172



哈尔滨178



沈阳184



集安188



大连194



青岛200



苏州206



杭州212



扬州218



绍兴224



宁波228



福州232



厦门238



泉州244



广州248



佛山254



汕头260



香港264



澳门270



台北274

听，那些濒危的城市声音280

绝版中国的守节者283

语录：保护派 VS 拆迁派288

沉重的遗产与家园之梦300

附录

1、中国世界遗产名录

2、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录

我们时代的心中困兽

寻找五千年文明存活的证据

中国独创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法，而在 109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规划里，“历史文化名城”总是“习惯性”地排在城市定位的最后一位或忽略不计。中国一向自称是“文物大国”，但目前已进入文化遗产损毁规律中的第二阶段（严重损毁），经济起飞、城市化加速，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最尖锐，文物古迹命悬一线。

看起来，中国的城市正在策动一次集体反攻，从对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到对线（历史街区）的尊重，再到对面（历史旧城）的省悟——一副浪子回头的样子。事实上，如果不能抑制住我们的内心困兽（保护的理性与大拆大建的感性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容易顺着建设新城市的发展潮流，把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令作为“文物大国”的中国，成为历史沦为绝版、传统成为绝响的中国。

中国真的有过五千年文明？

中国真的地大物博，文明源远流长？看上去是的。全国已知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就有四十余万处。但对比一下国土面积是中国 1/17 的法国吧，他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普查已确定全国二百多万处保护项目。当欧美国家旧城保护范围可以达到全城 80% 乃至 100% 的时候，中国有资格以完整城史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不过平遥和丽江。北京到今天，还有资格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杰作”吗？舒乙说：“政策上的导向也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你看明明是 2008 年奥运会，它非要提个‘新北京新奥运’，你为什么不提‘老北京新奥运’？大家之所以欣赏雅典奥运会，是因为它是个老雅典，人家可没有说‘大家一起来看新雅典’。”

中国城市面貌“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保护变成了重建，我们渐渐找不到中华文明存活过的完整证据。几代人在毁城灭迹，并令每一座城市都成了受伤的城市。

排队申请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排到 100 年后也评不完。这又如何？如果没有整体性的保护，这些名登大堂的历史文化遗产只不过是城市孤儿，没有兄弟，没有伴侣，也没有未来。

我们时代的政治正确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办私塾、穿汉服、行成人礼、投身环保一样，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即便在毁坏文物最厉害的城市，你都能从它们的城市规划中看到最确凿



无疑的字眼：“历史文化名城应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反对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大拆大建。”

2004年4月20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市长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50位参加学习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分管副市长联名发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倡议书，又说了一番政治正确、无可挑剔的话：“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应起主导作用，市长应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如果真的做到，则是中国四十余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二千万件可移动文物之大幸。

但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分别于2005年9月25日、2005年12月8日、2006年5月25日所作的表白中，我们知道中国的市长们并没有忠实履行他们的诺言。

旧城改造强势，文化保护弱势

阮仪三保护旧城，躺在江南古镇的推土机下有效，躺在河南的推土机下不一定有效。历史文化遗产能在哪里的推土机下活下来？这种感慨发自2005年11月12日，首届中外建筑与文化论坛。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王石秘书长归纳的论坛议题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中华文化传统是否面临间断？我们的主旋律是不是已经西方化了？中国文化是不是仅仅是一种零碎的点缀？中国人还热爱、认同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吗？中国人还有本土文化认同吗？

文人论道无果而终。很多文物保护部门、文化部门和规划部门都抱怨，与城市化、旧城改造、地产开发的势力相比，他们是弱势群体。保护旧城，有人觉得是古人在争我们的地盘；但重建式开发，我们焉不是在抢下一代人的地盘，并剥夺掉他们本该得到的历史遗产？

历史缺席了，城市虽然更新，但已千城一面，并且魂不附体。切断历史根须之后，每一个城市都是受伤的城市。

中国到2015年还剩下什么？

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屡屡惨遭破坏？两院院士、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注意到四个现实认知误区的存在：认为它形象破旧、是落后标志、浪费用地、阻碍发展。之后，有四种力量成为了大规模改造旧城的有力支持者：想利用历史基础赢得最高回报率的开发经营者、急于快速表现政绩的城市领导者、能从大拆大迁中得到好处的蹩脚规划师建筑师、急于改善居住条件赢得拆迁补偿的部分居民。

没有保护，谈何利用？这一点早在1987年下发的国务院通知中就明确了，但现状多的是为了利用而保护的急功近利。在某些局部历史街区和历史景观得到保护的同时，是历史城市总体



格局上更加肆无忌惮的破坏，只要没圈定保护的，就拆无赦——中国的县级、省级、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加起来近七万处，其余三十多万处没有被圈定的文化遗产因为没有保护伞，成了沉默的羔羊，随时可能被宰割。从2006年起，中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并计划“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但我们还能等到2015年吗？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项目，必须跟四种破坏性力量抢速度。

保护历史是为了发展旅游业吗？

这是错误的，但是发生了——发展旅游产业成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第一动机，历史文化遗产成了旅游产业的筹码。顺应这种思维，即便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激进人士，视拆毁胡同、四合院如同拆毁北京第二座城墙的舒乙，有时竟也以瑞典斯德哥尔摩保护0.8平方公里的旧城区获得的旅游利润占全城税收的60%为例，来“利诱”地方政府当局保护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通过旅游的确达成了部分价值分享与传承，但旅游也是有破坏性的，如果再丧失设置对游客的文化体验引导环节，文化遗产只是可笑的道具。而拆除真文物、兴建假古董尤为恶劣。

2006年9月1日，余秋雨批评一些城市在发展旅游业时对历史文化特色有一种市场叫卖的气息，“让我们非常安静地走在祖国美好的土地上，而不要走在叫卖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市场里。”在余秋雨眼里，历史文化资源只应是温和的、淡淡的底子，如果没有像金字塔、万里长城、兵马俑等让人见到以后神魂俱夺的东西，就不要硬做历史文化文章，有些东西有学术价值，不一定有旅游价值。

在历史文化遗产面前，中国城市当局和城市人最缺乏的，不是利用的智慧，而是尊重的教养。

我们的心中困兽

文物保护法重修已五年，文物保护观念更深入人心，但人心惟危。冯骥才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说：“在城市改造方面，如果说20年前我们的对手是保守僵化，那么现在的对手则是一味地追求新潮。我们不能容忍自然环境被破坏得一片荒芜，却公然放任珍贵的人文环境被搞成一片空白。”这是一场远未停止的战争，它不仅发生在城市的街道上，也发生在我们的内心；并且，不因有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上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而停止。

历史随风而逝，我们不是诗人，但我们至少是人。历史文化不能给我们带来名利，但它是城市之魂，能击中 and 抚慰我们内心深处的狂惑。只是，保护与利用、还原历史与重建新城、发展赚钱的经济与发展垫钱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内心困兽，难以解脱。

绝版中国

我们如此定义历史文化遗产的绝版：唯一性（独特的文化、科学、教育、美学价值），不可复制性（今天的工业不能替代历史的工艺），仍处于旧城改造与错误保护的威胁之中。

尽管一直在毁城灭迹，但也许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保护受伤的城市中的文化孤本，珍视我们的绝版中国。

让建设部增加文化司、让文化部增加建设司是不现实的。在健全政府体系之外，建立健全的非政府体系是现实的。不建设城市是不现实的，弃旧城改造、改激活旧城是现实的。

在合肥，市民已看不到三国古战场、“翡翠项链”上的老城墙，徒然有一些很具历史感的地名，这个屡经兵燹的城市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历史存活过的证据。苏州人比合肥人幸运得多，虽然小桥流水和小巷弄堂也不多见，但毕竟他们还可以住在古建筑里甚至买下产权，只要遵守“谁使用，谁管理，谁维修”的原则。

如果不能使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交相辉映，那不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错，而是我们一代人的无能！如果一定要在大拆大迁毁城灭迹之后以重建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创造力，那不是真正的智慧，反而证明了我们一代人的愚蠢！

（文/何树青）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文化部部长孙家正 3位中国部局长的表白

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城市在进化还是在退化，在保护历史还是在破坏历史，在创新文化还是在腰斩文化，国家建设部、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相对有发言权。

2005年9月25日，在西安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提交的书面发言如此评价：“急功近利的旧城改造方式，使历史街区遭受灭顶之灾。片面的求变、求洋、求大的心态，使一些历史名城风貌荡然无存，欧陆风盛行，导致千城一面。”

2005年12月8日，在长沙的全国考古工作汇报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痛心地说：“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使历经千年风雨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遭到远比战火和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损害。”

2006年5月25日，在北京的“文化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面对合众国际社记者提出“现在对前门的保护无异于对前门的破坏”时回答：“确实，有些城市片面地追求焕然一新的感觉，对一些历史的遗存，对一些老的建筑的保护做得是不够的。就北京市来说，你的批评我认为也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文化部特别是我个人，应该我做的事情没有做好，应该出席的会议没有出席，我没有做好，我接受你的批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保护研究所所长 张兵

城市规划概念被滥用了

问：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在哪里？

张兵：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内在精神的载体。假如你是一个生长在北京的人，或者只是半截来北京工作生活的人，那你对北京要有一个体验，就无法离开对北京城市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你不会爱上这座城市。任何时候，当一个人来到北京，看到保存下来这么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他才会感觉到这座城市的分量。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代人经历的时间都只是一瞬，一代人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同时要传递给下一代，这个任务说来很自然，但做起来不简单。人生有来路，死有归宿，城市的文化也是这样。我们这代人要保护好城市的文化遗产意义就在于此。

问：你所理解的城市文化遗产包括哪些？

张兵：城市文化遗产包括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部分。北京城市文化遗产中物质的内容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北京的整体，外部的山水环境，内部的空间格局，梁思成先生当年谈要保护北京的“全部”涉及了更多的内容；第二个叫做历史文化街区，北京 62 平方公里内划了许多片区，有一定历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生活还保持着一个有机的状态；第三个层面就是文物建筑，中央和北京市都有指定的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暂时没有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也有不少具有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城市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京剧、京韵大鼓是，豆汁焦圈也应该吧。

问：为什么把建设部办公大楼也看作是城市文化遗产？

张兵：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在新政权建立以后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建设时期，老北平被赋予了许多新的相应功能。上世纪 50 年代，中央政府的一些办公建筑经过了非常认真的设计和施工，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和建筑文化的思潮，这是北京这个城市历史和文化演变的一部分。建设部办公大楼就是其中一幢有代表性的建筑，三里河附近 50 年代建造的一批国家部委的办公楼也是这样。此外，建设部对面的百万庄小区，是 50 年代建成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居住小区，是历史性的，很有文化的色彩，它记载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居住生活的很多理念和思想。这个居住小区的规划当时学了很多苏联的东西，从外部空间设计的角度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双周边的布局方式，宅间的院落空间设计等等，现在没有几个楼盘能够做得那么精细认真。城市里面的一些建筑、建筑群，或者规划的布局能够记载城市某个发展阶段的步伐和脚印，就可以算得上是历史性的，可以看作是城市文化遗产。



问：为什么当前中国的建筑设计反而在倒退呢？

张兵：不能这样简单地说。但是，现在有些建筑徒有好的材料和技术，在建筑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上不及过去的一些历史建筑。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期，关于怎样才是中国的建筑，怎样才能反映民族文化，值得深刻思考。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建筑和规划界，很多建筑师和规划师都在认真探讨中国城市和建筑文化的表达，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自强的表现。

问：但是开发商并不关心这些。

张兵：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是商人，你就不能要求他扮演一个有文化责任感的建筑师、规划师的角色。建筑师、规划师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只能由建筑师、规划师自己来扮演和承担。

问：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兵：文化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里面有很清楚的表述。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两个行政部门来推动和监管的。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很多是由建设部牵头来做的，比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就是建设部牵头做的，但来自于文物界和规划界的专家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问：民间力量在文化遗产保护上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张兵：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政策，对于民间力量的参与要从公共参与政府决策的层面上来理解，不光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在很多政策制定过程中，如出租车调价，这些都是国家从行政上要求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个过程。现在民间力量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大，在政府关注的同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

问：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是不是鱼与熊掌？它们之间的最佳折中点在哪里？

张兵：首先这个命题是错的。文化遗产保护本身就是城市规划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现在的问题是城市规划这个概念被滥用了，人们对于它的理解有点偏。例如一个地方要拆房子，就会认为是城市规划的原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不够理想，领导批评起来常说城市规划的水准不高，于是就开始搞国际咨询了。大家对城市规划开始重视是件好事，但对城市规划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城市规划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规划法的雏形产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维护监管工人住宅的卫生标准，对居住环境质量的提高有非常大的作用；二战以后，一面是战后重建，解决战后房荒，另外一面开始强调对于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讲城市规划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是在新的城市建设中延续传统文化精神。

城市规划所涉及的工作是很广泛的，在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层面上都有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什么要强调新城的建设，其中一项就是因为设法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中落实对老城的保护。当然新城建设和老城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说建了新城，老城就能自然保住，还需要很多完备的政策来促进二者互动。



保护与发展一直是城市规划关注的两个主题。处理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增长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城市规划就是设法从空间和土地使用上解决这些矛盾。城市规划使用的是空间手段，要彻底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还需要政府部门操控的很多其他手段一起作用，光是空间手段是不够的。

问：中国在城市规划道路上走了那些弯路？

张兵：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界是非常努力的，从规划技术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城市规划并不落后。一个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如果从政府行政管理角度看，城市规划只是一种因素一种力量，它不可能是影响城市发展的所有力量。城市规划在做一种安排，对一个城市的空间使用作一个比较好的安排，要美观，要合乎自然，要合乎人的使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会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按照城市规划的一般原理完成一部规划，然后认认真真去实施，这城市就不会乱。正是由于在规划以外的很多力量干涉到了城市发展建设的过程当中，才使这种过程变得复杂，结果难以预料。城市建设质量不高有时是一个城市发展历史阶段特有的情况，有时是人特别是决策者对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律无知造成的，像拉链马路的问题，则是城市建设管理体制的问题。（采访/柯勇）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城市文化建设要避免8个误区

江苏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于2007年9月26日在南京召开，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城市文化建设与遗产保护作了专题讲座，他认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城市文明，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是一种飞跃，但当前中国的城市文化建设要避免8个误区。

一是避免城市记忆的消失。一些城市在所谓“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人文信息丰富、具有地域文化的历史街区、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造成了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二是避免城市面貌的趋同。一个城市文化发展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特色就越鲜明。很多欧洲古城都有一个天际线，只有公共建筑和宗教场所才能高出天际线，建于1909年的以色列特拉维夫，一直采用传统建筑方式保持统一色彩和样式，结果不到100年就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在古城内控高、控制色彩，不大拆大建，很好地保持古城风貌。但是不少城市在建设抄袭、模仿、复制现象普遍，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的特色危机。

三是避免城市建设的失调。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功能城市，

更在于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文化城市。南京明城墙的很多遗址公园，成为市民喜爱的休闲场所，北京也把仅存明城墙遗址建成文化绿地，美国纽约不到四平方公里的中央公园，给处于高楼大厦包围中的市民一个休憩的场所。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中往往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甚至出现了大片的绿地上只有几棵树、本应方便盲人的盲道修得九曲十八弯，既缺乏功能主题，也忘掉了文化责任。

四是避免城市形象的低俗。罗马万神庙、仰光金字塔、维也纳金色大厅，让人们感觉到城市是从历史中走来的。而我们身边有些令人忧虑的东西：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逼迫北京紫禁城，重庆标志性的朝天门码头、吊脚楼、石台阶被拆除。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做现代化的标志，而大量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五是避免城市环境的恶化。好的城市环境可以使人与城市更好相融。北京四合院在800年内调整完善，成为最符合北京风土人情、地理气候的居住形式，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居都是昙花一现，高层住宅兴起没几年，就听到一片抱怨了：高楼遮挡使一半的家庭没有足够的阳光；汽车、自行车没地方停；公摊面积大，物业费是普通楼的三倍。

六是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对城市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使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城市的追求，转化为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现在全国有一百八十多个城市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实际上被普遍承认的国际化大都市只有伦敦、纽约和东京，21世纪中国有望晋级的只有香港、上海和北京，现在大家都要争当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反映出攀比意识，更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定位的迷茫。

七是避免城市管理的错位。城市不光是个物质环境，而且要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这就需要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管理。人们往往认为楼高路阔的城市运行效率更高，但现在看来，小尺度城市更有优势，出行时选择路线多，有拥堵可迅速分流。

八是避免城市文化的沉沦。有很多城市的文化符号让人过目不忘，如黄河母亲、珠海渔女、郑成功雕像，但更多的是不锈钢钢柱上顶着或多或少的球，起个“腾飞”或“飞跃”的名，看不出城市的人文和历史。北京荷花市场牌坊下的星巴克、隆福寺街口的肯德基，西安钟楼边的麦当劳，这些洋品牌都深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地段。洋品牌的高明，反映的是我们“浅薄化”了自己的文化内涵，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

一位哲人说过：“了解过去的一千年，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后的五百年。”不幸的是，正处于强烈发展激情中的城市，包括众多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历史性城市，都无一例外地以规模化和形式划一的模式，扩展着原有的城市规模。这样这些城市就失去了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区别，失去了其固有的文化特征，也失去了这个城市的“根”与“魂”。